

輔仁大學校史檔案概況

吳瑞珠*

摘 要

輔仁大學校史室正式設立於 1980 年（民 69 年），設立之初以收集復校以來秘書室重要公函，以及復校初期的發展規劃案中，擇要保存的一些相關的信件、紀錄和照片。至 1987 年依據「輔仁大學校史室簡章」，校史室有了較明確的工作內涵後，開始拓增資料收藏的內容。

校史室設立迄今 25 載，按筆者認為，校史室的主要工作就是：將具有縱深及保存價值的學校歷史資料加以蒐集、編目、保存，並且進一步推展與校內專業領域的研究結合，而能對今日「輔仁人」在思考發展方向、研擬對策、追求創新之際，有所啟發及助益，如此才能展現校史的價值與意義。

因此，本文擬對目前校史室編目登錄之資料，系統化的情形加以介紹說明，使有興趣的研究者能掌握校史資料脈絡，而易於從事相關研究；另一方面則希冀藉由系統的資料，提供給校園文化更大更多的刺激和創造契機，因為它是有情感、有生命、兼具特色的集體記憶。

關鍵詞：輔仁大學、北京輔仁、台北輔仁、校史檔案、檔案目錄

* 進修部哲學系副教授兼校史室主任。

壹、前言：“有傳統才有根源，有創新才有歷史”

輔仁自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創辦，一九六一年在台灣復校，歷經國家社會環境劇變，人事更迭，在歡渡八十週年慶之際，回首這段豐富的歷史，藉由人、事、時、地、物的回憶考察，所觸動的不應、也不僅是每個研究者個人主觀內在的感動而已，在輔仁歷史編年的紀錄中，相信可以在此時此刻，提供我們面對外在激烈的大學競爭，及校內所進行的大規模校務整合時，更大更多的啟發和創造的元素，因為她是有情感有生命兼具特色的集體記憶。這對於肩負俗世大學與天主教會大學雙重使命的輔仁大學而言，確是邁向整全的輔仁大學可資運用達到「唯一」¹的利器。

貳、歲月流光中的輔仁

輔仁大學的創辦追溯歷史可前推至一九二五年²的北京。民國初年，基督教積極在華籌設大學，天主教教友亦感中國傳統文化與世界新知脈動接軌的迫切需求，而有上書羅馬教廷來華創辦公教³大學之舉，一九二五年始以英斂之⁴創辦之「輔仁社」作為大學設置的基礎。

輔仁大學因於中西文化交融之校風，又逢社會變遷與國家命運交纏連結而別具特色。至一九五二年中共教育部以院系調整名義將本校大部分併入北京師範大學為止，短短不到三十年的歷史，正式入學的學生共有 12,355

¹ 「唯一」，係現任校長黎建球教授就任後提出之治校目標，以與時下因缺乏價值觀引領，又無歷史典範依憑，以致無所不用其極追求「第一」之心態加以區分。

² 本校創校年代，因採標準有異，認定自有不同，歸納言有如下四個年代：(1) 1929 年—國民政府正式核准立案 (2) 1927 年—以單一學院准予試辦，「輔仁大學」之名始立 (3) 1925 年—北京公教大學在教廷支持下成立，以附屬「輔仁社」之名招生。(4) 1913 年—輔仁社初社之年，該社成立背景與輔大淵源極深。長久以來，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以 1927 年為輔仁創辦年代，而在台灣復校後，此間又以 1929 年為據，兩年之差距造成北京及台北兩地師生困擾。本室於八十九年間針對本項問題，經蒐羅各項文件、資料、紀錄、出版品及學術研究報告，論文彙集成冊，並邀集歷史學者、修會代表及資深校友提供意見，並取得共識，以一九二五年為本校創辦之始，北京校友會亦正式同意採取該年代為輔仁創辦年代。

³ 「公教」(Catholic)一詞來自希臘文，包括兩部分：Kata (按照)，holou (全體)，原來西方名詞譯為「公教」爾後在中國則譯為「天主教」。按 1999 年世界天主教大學名錄，全世界共有五十一所直屬羅馬教廷教育部之「公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⁴ 英斂之 (1867—1926) 正黃旗旗人，1888 年信奉天主教，1902 年辦天津大公報，與馬相伯為忘年之交，兩人均認為要促進公教在社會上地位，必須在中國開辦高等學府，於是兩人就合撰「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但未立即反應，英斂之遂先行於其居處—北京西山靜宜園中成立輔仁社。(參考陳方中教授：湯若望與英斂之宗教思想的聯繫，1992)

人，並躋身為北京四大名校⁵之列。一九六一年由於來台校友們的努力，終得以復校，並開始招收哲學研究所學生八名，至一九六三年購置新莊校地正式參加大學聯招而有最初的四百餘名大學部學生，至此，於焉展開輔仁第二階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育事業。

參、「校史室」的任務及工作

掌理輔仁大學校史的校史室正式設立於一九八〇年（民 69）年，由時任董事會秘書龔士榮教授（一九四四年畢業於北京輔仁歷史系）兼任主任職務，並以復校以來秘書室重要公函（含教育部、教育廳之復校規章、公文、羅馬教廷教育部文件及董事會重要記錄等等）及具有歷史意義之非文件類物品保存為主要工作。至一九八七年由復校後第二任校長羅光總主教手書〈校史室簡章〉，校史室業務始有明文依據。⁶為了能將校史做較精準之蒐集，本室於一九九六起將分佈於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美國本篤會院及校史室已有之文件、雜誌、函件、論文資料統整，於二〇〇〇年並擬定校史八階段⁷工作及蒐集方針和內容，五年來本室即按此方針逐步進行蒐羅，不斷地將所得資料整編。

校史工作在本質上就是一個了解或收集學校歷史的單位，基本上學校當局並不會也不必要特別注意，只要完成資料收集的任務，並在慶典或特殊日子中為師生或社會大眾提供學校歷史上重要的人、事、物記錄的功能即可。但是筆者認為「校史」必須與現實時空結合，才有意義和價值，而這層意義和價值又必須與學校重要活動或事件結合才能達到。因此宣示校

⁵ 時稱北京四大名校，為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燕京大學及輔仁大學。

⁶ 該簡章共六條，條文如下：

- 一、依照本校組織章程第三章第十三條，本大學設置校史館，以收藏有關本校之歷史資料。
- 二、凡有關本校成立、復校及增加院系所之公文，俱交本室收藏。
凡有關本校與他校締結姊妹校或簽訂合作協議之證書及協議書俱交本室收藏。
其他有關本校歷史之資料，亦交本室收藏。
- 三、本室編寫所藏史料目錄。
- 四、本室置本校大事紀，按月記錄本校重要事件。
- 五、本室設校史陳列館，陳列有價值之史料供大眾參觀。
- 六、本簡章由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改亦同。

⁷ 此八階段分別為：第一階段 1919~1923「輔仁社」之創辦及中國之教育環境研究；第二階段 1923~1932 本篤會創校和營運之研究；第三階段 1933~1950 聖言會接辦和時代背景之影響；第四階段 1950~1952 中共教育部院系調整之法令暨原則與輔仁院系調整之分佈研究；第五階段 1952~1956 校友師生之活動情況；第六階段 1956~1961 在台復校之籌備階段；第七階段 1961~2000 復但經多次座談修訂後，建議為校史蒐集方向參考，詳參，吳瑞珠，〈天主教輔仁大學的歷史與今日願景之整合〉，發表於〈益世評論〉，第 266 期或參考：<http://www.fuho.fju.edu.tw/about/writings.htm>。

史工作的重要性，本身收集政策的明確性，保存知識的專業性，和建檔工作的流暢性都屬校史工作必須注意的事項亦同時為重要工作內涵。

肆、校史資料內容及分類概況

本室正式設室時，由前于斌校長之主任秘書龔士榮教授兼任主任，龔神父為著名歷史學家陳垣校長⁸器重的學生⁹。一九九一年轉由曾任羅光校長祕書之張淑芳女士掌任並與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合併管理。筆者於一九九六年八月接任迄今將近十載。回顧十年的校史工作，資料的蒐集過程經緯萬端、整理工作耗日費時，至於研究與推廣工作，則需要更明智的規劃和積極鼓勵更多參與者的投入，才能展現校史的價值與意義。

為了便於爾後研究者，或專案活動檢索資料，特將本室近年蒐集所得資料按可參考資料、本室檔案分類及內容，擇要分項陳述如下：

（壹）一九六一復校之資料

一、可參考資料：

- （一）、校內秘書室重要公函。
- （二）、復校初期規劃案。（擇要保存的相關紀錄、信件和照片）
- （三）、校長室、祕書室之雜項物件。

*、背景說明：就校史室主管職務之便及個別認定之「重要」資料而予以保留所得部分。

二、檔案分類：除原先保存之文件，加上近年蒐集，歸入「復校類」（編號 200・0・0）、「台北輔仁類・文件」（編號 310・0・0）。

三、資料內容說明：主要為復校之籌備和初期相關重大事件之原件及重要記錄，重要檔案內容例舉如下—

- （一）、1963 年（疑）輔仁大學校歌之始末由作詞到作曲之討論（于

⁸ 陳援庵名垣，1880 年生於廣東新會 1971 年逝於北京。1926 年至 1927 年任北京公教大學副校長，1927 年至 1929 年任北京輔仁大學副校長，1929 年至 1952 年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1949 因中共教育部學習蘇聯教育制度，採單科制大學政策而對國內院系加以整併，輔仁大學院系大部分併入北師大，輔仁著名的經濟系併入人民大學，農學系 50 年併入農業大學，52 年家政系撤銷，輔仁西語系包括英語及德語，則將高年級學生及年資較長之教師併入北京大學，低年級之學生和年資淺之教師則改學俄語而成爲俄語系。陳校長則於 1952 年至 1971 年任接北京師範大學校長。

⁹ 參見邵台新，《龔士榮神父訪問記錄》輔仁大學學術叢書，校史系列（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0），頁 53-54。

斌與黃友棣之親筆函)

- (二)、1963 英千里副校長述校務問題之稿件
- (三)、1963 輔仁大學學則 (學生守則)
- (四)、1965 輔仁商學院與 Santa Clara 大學之五年技術合作計畫
- (五)、1967 第一屆畢業典禮邀請函、教宗賀辭、剪報資料
- (六)、1968 海洋學院籌建計畫
- (七)、1960 于斌校長與谷欣樞機主教討論捐款及運用報告
- (八)、1963 聖言會對招生、師資之設備規定；以及行政人員之津貼、準則問題題綱及計劃
- (九)、1965 輔仁大學校地相關事
- (十)、1967 日本產業大學簽約
- (十一)、1969 《輔仁學誌》登記證
- (十二)、1969 捐款募集 (中美堂、文友樓)
- (十三)、1970-1975 之行政會議記錄
- (十四)、1972 哲概人哲課程之設置首次討論會議紀錄
- (十五)、近年與如上事件相關發展事項 (如黃友棣為校歌譜訂正事)

(貳) 一九七九年《輔仁五十季》¹⁰ 出版之意義

一、可參考資料：

- (一)、輔仁五十年大事紀
- (二)、紀念文輯
- (三)、處院系簡介

二、檔案分類：以上資料歸入「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1·2·0)

三、資料內容說明：

按本刊物之出版，除了為慶祝輔仁大學 1929 年從北京正式以三院(文學院、理學、教育學院)獲准設立後的五十週年慶，時任校長之羅光總主教在序文中指出「全校師生願意追懷已往，策勵將來，乃編集《輔大五十年》，共相勉勵」書明了本刊物的主要目的。在這本刊物中由龔士榮神父主編之「輔仁五十年大事紀」，從 1866 年北京創校前之醞釀，建校之狀況與初期之發展，葦路藍縷的歷史以及在台灣復校之大事，首次以「編年體」的方式呈現，將北京與台北的輔仁歷史加以聯貫。另外就「紀念文輯」中邀稿的內容及撰寫者的代表性，實有助於對輔仁初創的目的、主事者之

¹⁰ 輔大編輯委員會，《輔仁五十季》(台北：輔大出版社，1979 年)。

思想，以及輔仁在五十年中所成就或未完成的教育理想和文教事業的掌握。至於「處院系簡介」在當時可能是一份輔仁大學在台灣自 1961 復校後，十八年來在組織、人事編制、教學設備的完整介紹。在「編後記」中編委會特別提出其遺憾「……對文史以外的外籍師長，也多飽學碩德的人士，竟沒有一篇專文為之紀述，而有關司鐸書院則篇腦幅比例較多，這全是稿源問題……」也說明了這本刊物在「紀念文輯」部分因徵稿問題所生之問題，但另一方面亦指出校史中不可忽略「外籍師長」的貢獻部分。

(參) 一九八〇年設立校史室之後

一、可參考資料：

- (一)、行政會議記錄 1979 起
- (二)、校務會議紀錄 67 至 69 學年度起
- (三)、七十一年度大事記要 (公共關係室編)
- (四)、各單位之彙編、名錄 (冊)、通訊錄、出版品

二、檔案分類：以上資料歸入「台北輔仁類·會議紀錄」(編號：313·0·0)、「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0·0·0)

三、資料內容說明：

本階段保存之資料因於校史室主任龔神父同時擔任董事會祕書，因此以各單位呈送董事會保存之出版品及會議紀錄為大宗。原應屬本階段之資料，因為 1997 年校史室銜命開始整理于斌校長遺物，及陸續由龔神父「釋出」之文件而得以補足，唯需再整理並歸併入檔。

(肆) 一九九一至九五年之進展

一、可參考資料：

- (一)、輔仁大學大事紀要 (自 80 學年度起，正式由校史室主編)
- (二)、接續收集之各單位之彙編、名錄 (冊)、通訊錄、出版品
- (三)、輔仁大學新聞、校內新聞、校史及與本校相關人物之剪報資料 (自 1979 年起迄今，1998 年後已與公共事務室合作)
- (四)、校內及校外舉辦之重要活動照片 (自 1973 年起)

*背景說明：

本階段因龔神父辭去校史室主任，而由原羅校長祕書張淑芳女士接任，以兼管「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名義聘為專任主任職務，並配置一位專任組員。專職人員的設置，及落實一九八七年羅校長所擬具的「輔仁大學校史室簡章」工作，使校史的資料收集及計畫有了初步雛形。又基於對校

史館的設置及展示需求，開始與在台校友會，及創辦本校之本篤會有較密切之接觸，並開始蒐集北京輔仁大學資料、出版品及擬定計畫。

二、檔案分類：以上資料歸入「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2·0·0）、「台北輔仁類·文件」（編號：311·0·0）、「台北輔仁類·圖片」（編號：370·0·0）。三、資料內容說明：

由校史室彙編之大事紀要，按時間序，採條列方式，列舉各處、室、院、所、系在年度內各項重大活動，資料由各單位自行提供，本室按照「大事紀要編訂內容擷取辦法」加以刪定。自八十學年度迄九十一學年度共 11 冊（如列入公共關係室編七十一年度大事記要則為 12 冊）。其他之彙編、名錄（冊）、通訊錄、出版品。

最早的資料是 1964 年之「輔大新聞」創刊號，最完整的則是自 1967 年第一屆迄 2004 年 38 屆共 51 本的畢業紀念冊（因日、夜分開出版，或加入「婦女大學」亦或如管理學院單獨出版及形式之關係）。

（伍）一九九六年後之規劃

一、可參考資料：

北京輔仁創校前、初期之文獻、史料
台北復校前、初期之文獻、資料
台北輔仁之發展

* 背景說明：

因於職務調整，1996 年由筆者接任校史室主任，業務交接時最重要的是一卷剛完成的六年（1996-2002）「校史室暨文物館特別計畫」工作專案，內容分校史室及文物館兩部分。校史館以（甲）創校、復校前之文獻、史料及修會檔案收集，（乙）有功人士資料收集、及對輔仁貢獻事蹟編纂為主軸的計畫，同時編列六年預算共新台幣 3,830,000 餘元。本項計畫雖從未向層峰正式提出過，卻給予筆者接掌的校史工作許多重點方向的啟發。

在心態上，筆者認為校史工作必須尊重前人努力的過程，無論在資料的收集、整理的方法或計畫願景上均盡可能持續，尤其不可因主觀認定的因素，而導致資料收集、整理工作和計畫執行的中斷，這是從事校史工作者最不能發生的情況，而這也是筆者一項校史工作倫理的堅持。

在實際工作中，自 1996 年始，本室致力於收集北京創校和台北復校之史料，併將「校史」與現實環境的需求與重要事件加以結合，例如與「大學入門」課程的配合，參與本校創辦七十週年慶的校刊《輔緣》編輯計畫，同時以該計畫蒐集之資料促成「校史陳列室」改館工程的實現。又在蒐羅

學校重要關鍵人物的資料時，除了平時持續的進行外，配合紀念活動或特殊節慶為快速有效的方式，例如于斌校長「傳記」出版及「百歲冥誕紀念」活動即為實例。另外由各創辦單位執行院、系、所史的撰寫計畫，和系所創辦人和名師的訪談和整理活動中，的確能讓師生在歷史的氛圍中體會到「使命，是一股使人在困境中仍能往前走的力量；特色，是一種說明為何存在的標示」¹¹的意義。例如「法·管學院發展委員會」在 1996 和 1997 年間共融活動之訪談活動，「聖言會使命室」自 2000 年開始推動的「聖言會與輔仁大學歷史淵源」的研究尤具代表。

總體來說，本階段校史資料的蒐集和發展，主要以前三階段的基礎，系統地將文物資料加以整理建檔，另一方面，則是將校史業務重新詮釋並賦予現代關聯與意義為重點工作。

二、資料分類：以上資料歸入「北京輔仁類」、「復校類」、「台北輔仁類」三大類中之「文件」、「人物」、「修會」、「系所建制」、「建築」、「出版品」、「圖片」七大綱中。

三、資料內容說明：

(一)、北京輔仁校史資料：

如前「1991 至 1995 年之進展」之說明，經過四年的摸索，由校史室同仁按校長指示所擬具的「特別計劃工作專案」，按其內容我們可以理解校史室基於業務軟、硬體的需求，必須加強蒐集北京時期資料的迫切性。

最初由創辦修會「美國本篤會」與輔仁大學的研究收集開始，此時以本校康士林教授 (Prof. Nicholas Koss, OSB) 的聯繫協助及美國舊金山大學利瑪竇中西文化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員吳小新先生對「北平輔仁大學前期 1927-1933 部分歷史檔案資料的介紹」(編號：112·1·0) 最為有效，本室因此得以掌握該期資料分佈地點如下： a)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 b)St. Vincent Archabbey Archive， c)Newark Abbey， d)St. Benedict's Convent Archives， e)St. John's University。

關於北京輔仁的出版品，最早及最具參考價值的是本篤會為募款在美國發行的雜誌〈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Bulletin〉(編號：161·2·0) 本室保存的為 1926 年 9 月之 No. 1 至 1934 年 9 月之 No.9 的影本，其中缺了 1930 年之 No.7 一期；及自 1933 年北平輔仁大學轉由聖言會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接辦後，同樣為了募款目的，在芝加哥出版了〈Fu Jen Magazin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China〉(編號：161·

¹¹ 魏思齊，〈前言〉，收於《求真之道—徹悟生命·洞悉萬象實知識》，理外民使命與特色叢書系列之一（台北：輔大出版社），頁 1。

3·0)，本室保存了 1935 年至 1940 年 6 冊影本；〈輔仁年刊〉(即為北平輔仁大學之畢業冊)(編號：162·1·7)，本室原收集 1944, 1947 至 1950 年共 5 冊影本；1989 年由李國良教授贈 1942 年刊原件乙冊，2001 年由聖言會柯博識教授贈入 1945 (1 冊)、1947 年 (2 冊) 原件。

《輔仁學誌》(編號：161·4·0)，具代表輔仁學風的學術傳統的刊物，於 1928 年 12 月創刊，由陳垣校長主編，本室蒐集了第 1 卷至 15 卷之出版。

《民俗學誌》(Folklore Studies)(編號：161·5·0)，係本校在東方民族學(人類學)之學術出版，於 1942 創刊，由聖言會士葉德禮教授(Prof. Matthias Eder, S.V.D.) 主編，本室蒐集了第 1 卷至 8 卷之出版。

另外則可藉由其他相關研究加以輔證，如 1993 年施麗蘭之〈Ying Lien-chih and Archabbot Aurelius Stehle OSB: the Beginning of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95 年吳小新之〈A Case Study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during the Benedictine Period〉，1997 年本校史研所研究生謝沁霓之〈《華裔學誌》研究 1950-1970〉等，得進一步了解北京時期資料及內容。其他出版品如董鼎編輯之《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孫邦華編著之《會友貝勒府—輔仁大學》教會在中國系列，在台校友會之《輔友生活》、《輔友報刊》均可做為了解北京輔仁大學之素材。以上可參考「北京輔仁類·出版品」(編號：160·0·0)，「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2·0·0)

1999 年由校友經校長自北京轉來存於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之「私立北平輔仁大學檔案目錄」乙份，後因 1999 年籌印校慶特刊，委由本校新聞傳播學習賢德副教授由北京師範大學檔案室擇要影印乙批檔案¹²，本室於 2000 年經整編歸入 62 卷，補充了 1999 年僅有目錄之缺憾。詳參「北京輔仁類·文件」(編號：111·0·0)。

〈輔仁校友通訊〉為「北京輔仁校友會」1984 年恢復活動後之刊物，內容有許多可補充正式文件檔案不足之功能。本室完整蒐集了第 1 期 (1984) 至 27 期 (2005) 之出版。「北京輔仁類·出版品」(編號：162·1·8)。

〈私立北平輔仁大學一覽〉，1937 年及 1947 年之影本 2 冊

〈Catalogue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43 年至 1948 年之影本共 4 冊。本室對北京輔仁時期資料之分類多置於「北京輔仁類」中，其中又分成文件、人物、修會、系所建制、建築、出版品、圖片七網。

¹² 參見習賢德著，〈自序〉，《北平輔仁大學札記》，輔仁大學學術叢書，校史系列 1012 (台北：輔大出版社，2004 年)。

(二)、北京輔仁照片類：

早期北京輔仁的照片，祇能由各項出版品中翻拍蒐集，近年來由於專案、活動之辦理及校友及相關人士的慷慨捐贈，本室已按性質加註圖說，分別列冊保存。本項資料置於「北京輔仁類·圖片」(編號：170·0·0)分類保存。

(三)、台北輔仁復校校史資料：

在台復校首任校長的主任祕書龔士榮教授如是說：「輔仁大學在台灣能夠復校，北平輔大在台校友的功勞，是不能磨滅的，這是于故校長一再所說過的」¹³。因此本室在蒐集校友會的資料時分為兩大部分進行：第一部分、紀錄與文件資料的蒐集，第二部分、出版品的蒐集。

第一部分由校友會王紹楨校友生前彙整之史料已歸「復校類·文件」(編號：212·0·0)。

第二部分則指 1958 由輔仁校友會創刊之「輔仁」至 1972 年第七期，本刊物對復校始末及至 1971 年之發展報導的內容翔實而豐富，本室完整保存乙套七期。

另一份校友之刊物為由校友總會於 1967 年發刊之「輔友生活」，主要在代替「輔仁」之增刊，因自 1967 年復校後第一屆畢業校友已加入校友會，因此活動增多，報導篇幅亦需擴增，為應實際需求而縮短出刊時間以三個月發行乙期，內容則以報導母校狀況、校友動態、會務情形等等，成為母校與校友非常有效之溝通橋樑。本室完整保存了創刊至 1982 年之第 18 期之刊物。「復校類·出版品」(編號：262·2·0)。

1980 成立「校友連繫室」出版報紙型之「校友通訊」創刊號，每季發行一期以連繫校友為目的，發行至第 9 期(1982)後，因申請登記為新聞紙類更改名稱為「輔友」雜誌發行至 21 期，至第 22 期改以雜誌編輯方式出刊，以每年出刊四期作為與校友聯繫之平台，本室保存創刊至 1996 年之 38 期共乙套，參見「台北輔仁類·出版品」(編號：362·1·10)

關於台北輔仁之復校史料，除了可參考如上所列之資料外，本室由董事會影印之呈報文件，及數年來因各項專案及遺物之整理而「出土」之文件，亦為一手之資料，參見「復校類·文件」(編號：211·1·0)。

(四)、台北輔仁校史資料

1. 正式文件

台北輔仁的發展在歷任校長，相關人員及修會的參與中，逐步在「時」

¹³ 參見龔士榮，〈台北輔仁大學復校簡述〉，<http://www.fuho.fju.edu.tw/about/writings.htm>

間的流轉裡、在輔仁這片校「地」空間中，由「人」為主體，構築了許多「事」件和「物」件。人、事、時、地、物五個向度，成為校史室在歷史文據的蒐集和實物保存的參考點。因此在資料分類項下，內容包括了「人」的部分，如歷任校長、副校長，董事長、董事，有功人士，行政主管，榮譽博士，校史人物等等。在「事」的內容，則以復校初期及四十年來發展之重大活動或事件，例如「哲學概論」課程最初規劃會議紀錄，校歌之作詞譜曲相關討論，第一屆畢業典禮以及院系單位成立相關資料，特色及學術活動等等，均可參考「復校類」（編號：200·0·0）、「台北輔仁類」（編號：300·0·0），更確實的部分在「台北輔仁類·文件」（編號：311·1·0）

在「物」件設備的發展上，本室將校園建築按院系、年代、特色加以區分彙整，參見「台北輔仁類·建築」（編號：350·0·0）。

2. 佐證資料

台北輔仁的發展，除了可以由如上的資料入手外，還可由本室蒐集之各種報紙、出版品、剪報及學生刊物甚至照片中得到豐富的佐證資料。例如「輔大新聞」、「傳播者」、「輔訊」、「輔仁大學新聞輯要、簡報」皆是，資料內容詳見「台北輔仁·出版品」（編號：360·0·0）、「台北輔仁·圖片」（編號：370·0·0）、「台北輔仁·剪報」（編號：314·0·0）

3. 專案文件（于斌、羅光、龔士榮）

此處所指專案文件，係校史室在執行專案時所蒐集的資料，雖與校史不全然有絕對關係，但是卻可供校史在人、事、時、地、物各方面加以佐證之資料。

例如：為了 2001 年在紀念樞機百歲冥誕時完成《于斌樞機傳記》的任務，1997 年本室開始籌備撰寫工作時的蒐集與整理¹⁴，帶動了因照片整理而出版的《畫傳》，在《傳記》出版的同時，亦出版了《言論集》、《詩集》、《光碟》，同時完成歷任校長資料收集的範例，奠定了日後有關「人」物資料蒐集的方針。于斌校長資料可參考「台北輔仁·人物」（編號：321·1·0）。羅光總主教生前已有系統地將與輔仁有關事件，在其著作中清楚

¹⁴ 參見吳瑞珠，〈摸索與淬煉－《于斌樞機傳》編撰經過〉，收於 <http://www.fuho.fju.edu.tw/about/writings/7.htm> 「……首先由委員就所知部分撰文或提供線索資料。第二，規劃名單進行口述歷史工作。第三，重整樞機遺存本館廿七本自 1939~1976 年的日記行程本。第四，儘可能收集樞機所有出版品，報章、雜誌、錄音之言論內容並加以分類。第五，他人撰寫有關樞機之文字之收集。第六則是檔案、評論、文件（含外交部、國史館之檔案，以及復校期、耶穌會、聖言會、中國聖職等單位）之收集。至一九九八年九月，校史室已可以大致將資料分析出兩大類：一為樞機遺物；一為研究樞機之可用相關資料。」

交待，參見總主教《羅光全書》第二十五冊，其他文件資料則陸續轉入校史檔案中，2004年逝世後遺物中最重要的是乙批自1951年至2001年之日記本四十五冊，經台灣主教團同意轉入本室，參見「台北輔仁·人物」(編號：321·2·0)。(因未整理，暫不公開)。

龔士榮神父生前極少個人資料留存，但因其在本校復校過程中扮演極重要的輔佐角色，個人資料及觀點具有代表性，因此歷史系邵台新教授於2000年完成的《龔士榮神父訪問紀錄》¹⁵，已將龔神父生平及思想完整的呈現。2002年重病彌留時，交待吾於1998年為整理于斌校長資料數年來，所提各種有關輔仁大學復校問題，已初步撰寫成手稿及于斌校長交付之文件可轉由校史室保存處理。2002年8月逝世後，2005年由筆者與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主任陳方中教授具名，獲使命副校長室專案補助整理龔士榮神父與輔仁大學有關文件，初步研究成果可參考此次研討會陳方中教授論文「龔士榮神父所參與的輔仁大學一輔大易長事件」。相關目錄詳見「台北輔仁·人物」(編號：322·1·0)(此份資料僅開放供學術研究)

(五)、創辦修會與輔仁大學

縱觀輔仁的歷史，如果沒有天主教會各修會人力、物力的投注，實難竟其功。但是在1950年間，當于斌主教為復校奔走時，

……接觸了十幾個修會，或因在大陸損失慘重，或因台灣局勢未定等等理由，都婉拒了。只有聖言會答應，但無力單獨負責。耶穌會方面，臺灣耶穌會士都有負面的反應，他們那時有幾位在台大任教，且有相當大的教授宿舍成立了伯達書院，為教書、接近青年學生，照顧在校教友同學非常方便，既不需負學校的行政責任反可領取薪水來從事他們的工作。後因羅馬總部已答應教宗協辦，乃勉強接受，於是和聖言會協商，要求相當程度的自治。¹⁶

按龔神父的看法「這就下了三單位以後不易整合的種子」¹⁷。

但是，如果從修會檔案資料，及實際參與復校工作的神長與團體長上的報告和書信當中，又可以了解輔仁在同一事件下不同角度的觀點。因此本室近年來積極敦請修會團體，以修會立場研究與輔仁大學關係的用意，即在呈現歷史元的面向，以利我們在豐富多元的歷史內涵中萃取輔仁的精

¹⁵ 參見，邵台新訪問，林宜欣紀錄，《龔士榮神父訪問紀錄》，輔仁大學學術叢書1002，校史系列(台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0年)。

¹⁶ 龔士榮，〈創校維艱〉，2001年畢業典禮講話，收於<http://www.fuho.fju.edu.tw/about/writings.htm>

¹⁷ 同上。

華。

1. 本篤會

按時間序，修會與輔仁大學的資料可分為北京及台北兩期，北京時期以「本篤會」(Benedictine Order)與「聖言會」(the Society of Divine word)為主，台北時期則應以「聖言會」、「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與「中國聖職單位」為代表。

美國本篤會身為輔仁創辦修會，1923至1933年那段期間為輔仁投注的心力和該會的傳統和特色，在輔仁歷史中，實已內化為輔仁精神的一部分，此段令人動容的歷史可參考《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1923~1933》一書，其中有翔實的說明。該書係摘譯自傑若米·歐特金(Jerome Oetgen)所著之《美國聖文森總修會傳教史》中第六、七章中三大段落，由校史室徵得本篤會尚義院(Wimmer Priory)院長康士林修士同意並協助於2001年所出版。

2. 聖言會

聖言會於1933受邀接管輔仁大學，至1949年大陸政權轉移，1950年中共教育接辦，1952年以院系整併入北京師範大學，北京輔仁大學第一階段結束。在聖言會經營輔仁的這段期間，學校發展快速，在抗戰期間捍衛學術自由，反抗日本人的威權，使輔仁大學的歷史中又加入了身為天主教大學的堅持與愛國的傳統。有關此段歷史，在聖言會方面一直未有人加以全面整理。約在2000年左右，經筆者前後與該會柏殿宏教授及省會長柯博識教授反映說明後，獲得其認同並全力協助，以信件或趁往返羅馬總會訪問之便，赴「總會檔案室」多次了解，並複印北京時期及台北復校時修會保存之資料，轉本室存參。內容有總會保存與輔仁有關之檔案目錄，呈報會長之董事會紀錄，與耶穌會分工備忘錄，于斌主教討論復校事宜紀錄等等，置「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2·1·0)(部分資料暫不公開)，後又陸續複印北京時期本篤會及聖言會買地之契約紀錄和財務報表，見「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2·2·0)(暫不公開)，最珍貴而有研究價值的是柯博識教授於2002年09月赴羅馬檔案室影印攜回本校的報告及會議紀錄乙批，經筆者逐頁整理並按聖言會羅馬檔案室編號對照彙整後，裝幀成四大冊以利研究，詳見「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2·6·0)(僅供學術研究用)。因參與蒐集上述資料的過程，「激發」了柯博識教授強烈的使命感，柯教授於是在2003年開始著手編著《聖言會與輔仁大學》約十萬餘字，目前翻譯即將完成，已進入校編階段本室預計在2006年正式出版。

有關台北復校後聖言會檔案原件，因該會無人能決定是否轉交校史室，因此目前暫存耕莘樓 312 室，由本室協助完成檔案資料目錄乙份，參見「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2·7·0)。

聖言會除了在資料的蒐集與本室密切配合外，在「使命室」的規劃的系列活動中亦與歷史靠攏，鼓勵院、系、所史之蒐集撰寫，發動單位內之教師、行政人員從事與聖言會與輔仁大學相關之舉措，有貢獻人物之研究與側寫，豐碩的成果展現在聖言會三冊出版品中，請參考：《求真之道—徹悟生命·洞悉萬象賢知識》，《致善達仁—善省己身·明達道德與科技》，《尋美之旅—美感經驗·藝術與審美》。「台北輔仁·出版品」(編號：361·20·0；361·21·0；361·22·0)

3. 聖神婢女傳教會 (the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SSpS)

在輔仁大學的歷史中，女生向以不同於一般的優雅，並以展現女性聰慧氣質而聞名，這可能或多或少必須歸功於修女們如慈母的護佑，和嚴格的生活常規訓練所致。早在 1930 年當明尼蘇達州聖若瑟的聖本篤女修會 (St. Benedict's Convent, St. Joseph, Minnesota) 的六位修女抵達北京，欲在大學中成立一所女子學院即展開女修會加入輔仁大學的教育行列的歷史。¹⁸這所女子中學於 1932 年秋天開學，有二十名女學生。1933 年因學校轉由聖言會接管，部分修女到開封工作，直到 1948 年被迫離開。¹⁹

1933 年聖言會開始在北京輔仁大學工作，聖神婢女傳教會亦隨之開始在北京輔仁女中工作，由盧德思修女 (Sr. Othgerina Gertrud Luters) 及戴修女 (Sr. Siena Maria Derbogen) 與北京的本篤會修女進行談判。²⁰1937 年吳秉雅修女 (Sr. Urbania Maria Tueshaus) 到北京，1939 年在聖言會的協助下創辦了家政系。²¹聖神婢女傳教會認為「忠於會祖的遠見，我們和聖言會攜手合作，共同在輔仁大學從事教育工作。……藉著我們在輔仁大學的角色助長教會的使徒福傳」²²。1963 年吳秉雅修女在聖言會支持下成立家政營養學系。

聖神修女會與輔仁大學的關係，對輔仁大學的貢獻以及就歷史的發展和使命的反省，最完整的研究可參考，羅麥瑞教授 (Sr. Maryta Laumann)

¹⁸ 參見傑若米·歐特金 (Jerome Oetgen) 著，張琰譯，《北京輔仁大學創辦史：美國本篤會在中國 1923~1933》，台北，輔大出版社，2001，頁 58-59。

¹⁹ 全上，頁 93-94。

²⁰ 參見雷立柏，《聖神會在華 1905—1955 年》，為其編寫之《聖言會與聖神會人物考》之部分，2002 年已完成大半，尚未出版，頁 10，72，75。

²¹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編輯委員會，《北京輔仁大學校史 1925—1952》，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頁 243。

²² 參見〈聖神修女會在輔仁大學〉，收於《聖神婢女傳教會在台五十週年紀念冊》，台北，頁 14。

所撰〈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Holy Sprit Sisters 1963-2004〉²³。以上相關資料置「台北輔仁·出版品」(編號：361·22·0)。

4. 耶穌會 (the Society of Jesus)

關於耶穌會與輔仁大學的資料，本室在史料蒐集上自 2000 年迄今共得：

- (1) 自省會長辦公室影印之 38 張蒐集而得之信件、剪報及出版品照片頁。
- (2) 《寧靜致遠 德厚流光》—張宇恭神父執教三十週年紀念刊物。
- (3) 輔仁大學法管兩院發展委員會編輯，《星光熠熠伴我行》，輔仁大學法管兩院與耶穌會共融訪談系列文集
- (4) 沈起元神父 (Fernando Mateos, S.J.)，〈耶穌會史 第九章—輔仁初期的困難〉(Chronicle IX The difficult beginnings of Jujen University) 為該會參與台灣復校初期，相關協調、考量及計畫，以及投入資金的估計等等之紀錄。(本份資料未獲同意，暫不公開)
- (5) 費濟時主教 (Msgr. Eugene Fahy, S.J.)，〈Bamboo Shoots I-XVIII〉，為 1952 年-1996 年向會長報告的影本，共裝幀成十八冊可供耶穌會史研究參考。(暫不公開)

以上相關資料置「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4·0·0)。

5. 中國聖職單位

中國(國籍)聖職在復校初期，即與于校長共同肩負各項校務籌備、執行及與修會整合協調的工作上，因此在校史室的資料上即已重點涵括。

2005 年中國聖職單位使命室在代表林吉基教授的敦促下，開始進行「溯根系列」之工作，首先著手整理的是文學院院長高思謙神父之行史，並已出版。進行本計畫所得之訪談紀錄、資料影本已存入校史檔案，見「台北輔仁·修會」(編號：331·0·0)。

伍、未來發展的努力方向

綜合以上的說明，「系統整理」在校史工作的執行順位上，這幾年被本室列為優先的工作，因為我們深刻體認到，大批的文件資訊如僅是蒐集保存而缺乏整理，基本上祇是沒有多大意義價值的資訊而已，當然也無法

²³ 羅麥瑞，〈Fu Jen University and the Holy Sprit Sisters 1963-2004〉，收於《尋美之旅—美感經驗·藝術與審美》(台北，輔大出版社，2004)，頁 408-502。

讓現在的人與過往產出關連，更遑論延續精神或借鑑了。基於數年具體推展校史工作的經驗，筆者認為在下一個階段，校史的工作應再朝以下幾個方向努力：

一、落實〈校史室簡章〉資料蒐藏政策

所謂校史就是「在輔仁大學這個空間中，每段時間由人從事的活動所留下的紀錄」，雖然不是每一件事都會對這個具體存在的實體有重大影響，或值得紀錄，但是嚴格的說，如果我們將比例尺放的愈大，那麼在這個空間所曾發生的事物都可能都與校史有關。基於這個想法，我們除了依照〈校史室簡章〉所規定之業務及資料蒐集標的執行，對現階段資料，以每年各單位提供的「大事紀」為基礎，做為校內單位橫向發展的紀錄依據，因此如果各單位檔案文件能順次收集，並依規管理，校史室的工作能較為完備的原因即在於此。另一方面我們則謹慎的將校史室及「檔案室」²⁴的業務功能加以區分，筆者認為校史室與檔案室的業務分野在於，檔案室應以文件之收發、管理及保管借調為主，而校史室則是對具有縱深及保存價值的檔案資料加以蒐集、編目、保存及研究甚或出版和展覽做為重心。因此目前散佈在研發處有關增設院系所之公文、締結姊妹校、簽訂合作協議之證書及協議書，祕書室保管之本校成立、復校公函原件，甚至董事會掌理之業務中對學校整合改革相關議決，在某年限後都應整理入校史保存，否則經過時空轉移、人事更迭的因素，恐將「永不可考」。

二、建立校史資料的蒐集網絡

「網絡」的意義在於建立一套屬於校史應蒐集的資料，可以藉由制度或人為的意識準確的流入校史檔案系統的概念。

以本校「大事紀」為例，就是一項建立的制度，雖然在實際執行上的確造成基層同仁的業務負擔，但是如果我們以一種負責及務實的態度來看，則我們又不得不肯定這個制度的必要性，它的問題祇是在執行上校史室及各單位間應如何精簡作業並加以改善而已。

再以人為的意識來說，如果在輔仁的同仁都能意識到，我們所奉獻的歲月 and 我們每一日的工作，自然的都將在輔仁組織中留下痕跡，但是以人短暫的生命所成就的事物，祇有經過歷史的檢證才能呈現其客觀的意義和價值的事實上，將個人所完成的事物整，加以整理歸檔，的確是一項值得及負責任的作為。如果能肯定這樣的制度和概念，那麼我們同時也就建立起了一個校史資料的蒐集網絡，使學校每一項創新的建樹都能成為編織輔

²⁴ 輔仁於一九八七年間曾設置「檔案室」，然因人力、空間問題而停辦。

仁歷史的素材。

三、建構校史與專業（特色）研究系統

輔仁的創辦原就與時代命脈相聯結，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會處所展現的辦學宗旨與目標已可顯現其端倪，這種說法我們可以從歷史事件中去印證。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宗座代表剛恆毅樞機主教在北京主持教學主樓的奠基典禮中的演講詞中指出「一個民族的革新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思想的改革；……輔仁大學是保持完整中華文化的有力工具，正如教宗庇約第十一曾以莊嚴的語詞所過說的『輔仁大學擔負著中國新生的使命』……」²⁵，又在台灣復校後，于斌校長曾說：「這個學校雖是天主教主辦的大學，實在是為教育普，為好學的青年來辦的……」²⁶，由之可知輔仁的歷史在使命的角度來看蘊涵了極多元的內容，而這正是目前各個特色使命單位可開展的思維點。

從事校史工作除了大量的文書資訊的蒐集和處理工作，最重要的核心應是以上所提及相關研究的進行，因此本室在進行是項工作時，多年來以採取橫向聯結的方式，與校內相關所系教授及研究中心配合，不論是口述影音製作、文字撰寫或軼聞軼事的採集，翻譯工作進行或各項資料收集及座談會的舉行，都是在促使本校校史各個面向呈顯並益增完善的途徑，下階段本項工作將成為校史工作的重點。

四、持續進行校史教育及應用推廣

本校在校訂必修的「大學入門」課程開設之初，校史室即擔負課程之一：「輔仁校史簡介」，積極扮演使校史與辦學宗旨目標前後呼應，讓師生體會出輔仁的獨特性及歷史的價值的角色。除此之外在各項師生同仁的活動、訓練、講習等場合中，均以校史與各該活動的關係加以介紹，近年則以輔助教材之編輯，出版為方法，協助老師們在教學上之應用，往後此項工作應更普遍至教職同仁間，因為我們確信這是輔仁能以「唯一」去建構使命特色的基礎。

歷史是人特有的活動方式，人的歷史展開於空間與時間內，如果有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則我們可以由此看到人如何在多重限制中，經由明智創造出嶄新局面的努力，校史的確見證了這個事實，也處處產現當代的新意。

輔仁的歷史和其孕育的校風是本校最豐富且珍貴的資產，而校史工作

²⁵ 參見張振東、李貴榮譯，〈輔仁大學的建校目的一剛恆毅樞機的演講詞〉，收於輔大編輯委員會，《輔仁五十季》（台北：輔大出版社，1979年），頁39。

²⁶ 于斌，〈校長歸國返校演說〉，記於1961年記事本，9月14日及9月20日，頁42。

就是去協助大家彰顯這項特色。校史工作絕非一蹴可及，它是一個需要集體關心和參與的工作，但是如果我們確信「有傳統才有根源，有創新才有歷史」，那麼我們已經攜手同心地在這條路上邁進。

後記：本文所檢附之「天主教輔仁大學校史檔案目錄」為爾後檢索校史，以及資料蒐集之依據，並為本室檢索系統之準備。整理期間得台南藝術大學博館所賴玟忻與輔仁大學史研所陳建宇兩位研究生之協助，得以完成此目錄，「居功厥偉」，在此一併致謝。